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审视当下乡村小说创作，小说家的家园——“新生代”作家锐气何在？走出小说创作的尴尬，呼唤文学大师，不能不尴尬的文学批评，自由撰稿人何时能成气候，世纪之初的城市文学，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与人生悲剧，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西戎：从“吕里娃”到“人民作家”，孙谦的农民情节，《汾水流长》给胡正的荣誉和启示，李束为：从战士到作家，新世纪的“晋军”，“山西新世纪文学奖”概观，山西青年作家，世纪之交颇具潜力的队伍，历史悲剧的回声，由《茶道青红》谈成一“晋商”小品，西戎：从“吕四婆”，发人深省的作品，关注社会焦点，《左权将军家书》的价值，荣誉和启示，李束为历史，由《神圣约定》谈“官场小说”，成功的跨越，用实绩证明实力，山西青年作家，人生意义，从女性视角挖掘人生哲理，既有慧心又不失深沉的写作，黄晓阳：《山西文学》字名著改编，正视影视剧的常识性错误，“山药蛋派”作家的电影文学创作，代表性传承人访谈，根本，《生死之恋》：史实与艺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杨占平◎著

Wenxuedechulu Guanzhuminsheng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现状的思考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 审视当下乡村小说创作 小说家的家园 “新生代”作家锐气何在？ 走出小说创作的尴尬 呼唤文学大师 不能不尴尬的文学批评 自由撰稿人何时能成气候 世纪之初的城市文学 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与人生悲剧 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 西戎：从“吕里娃”到“人民作家” 孙谦的农民情节 《汾水流长》给胡正的荣誉和启示 李束为：从战士到作家 新世纪的“晋军” “山西新世纪文学奖”概观 山西青年作家 世纪之交颇具潜力的队伍 历史悲剧的回声 由《茶道青红》谈成一“晋商”小品 西戎：从“吕四婆”，发人深省的作品 关注社会焦点 《左权将军家书》的价值 荣誉和启示 李束为历史 由《神圣约定》谈“官场小说” 成功的跨越 用实绩证明实力 山西青年作家 人生意义 从女性视角挖掘人生哲理 既有慧心又不失深沉的写作 黄晓阳 《山西文学》字名著改编 正视影视剧的常识性错误 “山药蛋派”作家的电影文学创作，代表性传承人访谈 根本 《生死之恋》：史实与艺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戏剧行业 戏剧、电影的《地气》的价值 祁隽藻：张扬人性，山西文学 名著改编 话剧《立秋》的语言艺术 艺术创新与思想启迪的完美结合 美于现实主义文学 人物访谈 根本 状的思考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 审视当下乡村小说创作 小说家的家园 “新生代”作家 《生死之恋》：史实与艺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 WENXUE PIPING SHUXI

|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

文学出山路 关注民生

的



杨占平◎著

Wenxuedechulu Guanzhuminsheng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题材的思考 文学的本真性 关注民生 廉洁当下 乡村小说创作 小说家的家园 “新生代”作家锐掌批评 自由撰稿人何为 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长流》给胡正的荣誉和启示 “学院奖”概念 且看青年作家

· 美文与艺术
隽藻：张扬人性

的语言艺术 艺术创新与思想启迪的完美结合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
· 关注民生 廉洁当下 乡村小说创作 小说家的家园 “新生代”作家锐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 / 杨占平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8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 张平, 张明旺主编)

ISBN 978-7-5378-3751-4

I. ①文… II. ①杨…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5210 号

书 名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

著 者 杨占平

责任编辑 陈学清

封面设计 阎宏睿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010-58200905 转 801(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 转 802

网 址 <http://www.b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 太原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751-4

定 价 26.80 元

山西批评家实力的集中展示

——序《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张 平

山西是文学大省，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出过许多成就卓著的大作家，也出过不少大评论家，比如唐代司空图，就写过文学评论经典《二十四诗品》等作品。近现代山西文学史上，同样有过一些影响很大的评论家，比如李健吾等。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我省创作的繁荣兴盛，文学评论发挥了引导和推动创作的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批评家》杂志为核心，凝聚和培养出一支在全国评论界令人瞩目的评论家队伍，成为“晋军崛起”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评论家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砺，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富，理论素养越来越厚实，评论视野越来越广阔，写作成就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省作家协会决定推出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以展示我省文学评论家的实力。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入选的八位中青年评论家段崇轩、傅书华、苏春生、陈坪、杨占平、侯文宜、杜学文、王春林（以年龄长幼为序），都是当下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都还在职，担负着宣传、文学、教育、科研等方面党的领导或教书育人工作，并且都已经从事文学评论二三十年，出版和发表过许多专著和评论文章。这次，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遴选出了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代表了他们各人的学术水平和评论风格，应当说，集中体现了山西批评家的整体成就，是山西文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重要事情，对于进一步促进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自己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偶尔也写点评论文字；不过，却一直重视和

关注文学评论，有不少评论家是我的老师或朋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都给予过难忘的帮助，这次《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的八位评论家，多数都写过关于我创作的文章。因此，我对评论家的创造性文学劳动非常尊重。人们常说，评论和创作是文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健康的高水平的文学评论，就难以有创作的不断提升。评论家通过对作家与作品的解剖、分析、判断，通过对与作家作品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讨，实质上是参与到了整个文学秩序中，并构成强有力的一环。

就国内目前的文学评论状况而言，我认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演变，评论也已趋向多元化。文学评论作为文学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变化；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与社会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评论也不例外。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也随之发生了遽变，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创作本身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文学评论自然不能仍旧墨守成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的艺术风格时，在研究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了。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自身的理论基础、观察问题的角度、写作的方式等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也越来越新颖、宽泛。应当说，文学评论总体上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了。这个特点，我们从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理想的文学批评当然是既要有“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又要具有“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文学批评也难以达到这种理想化程度。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作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指导创作的作用，评论的价值也就体

现出来了。不管是“作协派批评”，还是“学院派批评”，或者别的什么批评，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不过是表达方法方式不同而已。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分。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败，或者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既需要“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也需要“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还需要别的批评从另外角度进行透视。这样，对于所评作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才是有益的。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就我所接触的作家而言，绝大多数对批评家是友善、尊重和理解的，他们认为批评和创作是相互联系的，都是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批评的创作是不完善的；对于批评家关于创作的看法，有些作家确实受到了启示，即使有些看法不一定符合作家的创作意愿，也能够理解，因为从评论家的角度看作品，总是与作家有一定的不同。当然，也有少数作家认为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而生存的，轻视批评家的作用，这只能说这些作家还没有真正理解了批评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他们阅历的增多，会逐渐改变这种态度的。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的面世，我觉得对于八位评论家的写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小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时，对于整个山西文学评论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启示意义。希望全省的老中青评论家都能够不断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建立各自的风格特点，积极参与到全省和全国文学创作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实力，为进一步推动山西文学创作大繁荣大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2012年4月16日

(张平：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思 考

1

-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现状的思考 / 2
-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 / 14
- 审视当下乡村小说创作 / 20
- 小说家的家园 / 25
- “新生代”作家锐气何在? / 29
- 走出小说创作的尴尬 / 31
- 呼唤文学大师 / 33
- 不能不尴尬的文学批评 / 35
- 自由撰稿人何时能成气候 / 37
- 世纪之初的城市文学 / 39

判 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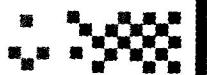
43

- 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与人生悲剧 / 44
- 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 / 61
- 西戎:从“山里娃”到“人民作家” / 71
- 孙谦的农民情节 / 82
- 《汾水长流》给胡正的荣誉和启示 / 93
- 李束为:从战士到作家 / 102

- 新世纪的“晋军” / 113
“山西新世纪文学奖”概观 / 124
山西青年作家:一支颇具潜力的队伍 / 138
历史悲剧的回声
——读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 / 141
由《茶道青红》谈成一“晋商”小说 / 143
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作品
——评大型报告文学《根本利益》 / 146
关注社会焦点
——评赵瑜新作《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 / 149
《左权将军家书》的价值 / 152
在穿透历史中超越历史
——评长篇小说《水旱码头》 / 154
由《神圣约定》谈“官场小说” / 158
成功的跨越
——由《母系氏家》谈李骏虎小说创作的转型 / 161
用实绩证明实力
——读韩思中的小说新作 / 166
揭示底层民众的人生意义
——读陈克海的两部中篇小说 / 169
从女性视角挖掘人生哲理
——读弱水散文随笔集《如果你叩我的门》 / 171
既有慧心又不失深沉的写作
——由《飘红》谈李燕蓉的小说 / 175

黄河文化孕育出的山西文学

——由《山西文学大系》出版谈起 / 180



讲述一个国际文化品牌的诞生过程

——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纪实》 / 183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访谈录》的价值

/ 186

建构批评家的个性世界

——评侯文宜理论评论集《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 / 188

独特的批评视野

——谈林红的现代作家研究 / 191

影 视

193

简论电视剧与文学、戏剧、电影的关系 / 194

将“炒作”进行到底 / 204

你拍电视剧给谁看 / 206

假如阿Q成了影视明星 / 209

且说文学名著改编 / 211

正视影视剧的常识性错误 / 214

“山药蛋派”作家的电影文学创作 / 216

让观众喜欢是根本

——电影《暖春》成功的启示 / 226

《生死之恋》：史实与艺术相得益彰之作 / 229

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的价值 / 231

电影《地气》的价值 / 234

祁隽藻：张扬人性的古代政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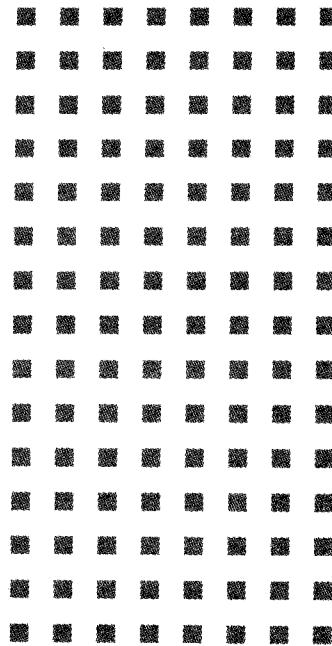
——评电视剧《天地民心》 / 237

《矿山人家》：关注社会焦点问题的剧作 / 241

话剧《立秋》的语言艺术 / 245

艺术创新与思想启迪的完美结合

——评说唱剧《解放》 /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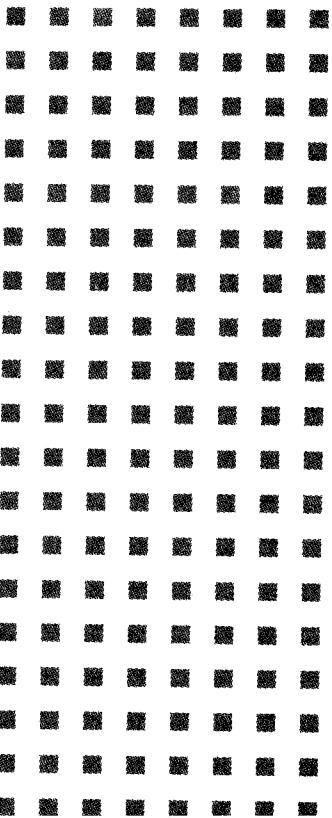


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

WENXUEDECHULU GUANZHUMINSHENG



思 考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现状的思考

一 现实主义创作现状概述

近年来,应当说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一些名家不约而同捧出了长篇新作,比如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秦腔》等,都是用苍凉而悲怆的生活剪影,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化作艺术的展示;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毕飞宇的《平原》等,都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抒写历史事实,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曹文轩的《天瓢》、孙惠芬的《上塘书》等作品,都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可以说是多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代表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既坚持现实主义,又不失自己的艺术个性,是这些小说的共性。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十年中,许多作家已经自觉地从事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像陆天明的《省委书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平的《国家干部》,吕雷和赵洪的《大江沉重》,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阎连科的《沧浪之水》等名家之作,还有《花腔》《歇马山庄》《水乳大地》《扎根》等一批青年作家的优秀之作,都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强烈感触下写出来的,都是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展示了改革时代社会生活的多元画卷。这些作家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以及在艺术上的丰富展现,都显示出近年来现实主义创作的提升和成熟。它们以直面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传达群众心声吸引着读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也为走向边缘化的文学创作带来一种气势、一种人气,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亮点和热点。

应当说，多数作家、评论家对目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状况大体上还是比较认可的，认为这些作品越来越锐利、越来越深刻了。比如这几年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力度有目共睹，当然地成为创作的基础。现实主义创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作家的人文关怀，重新投向普通群众这个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为底层的百姓说话，为弱势群体写作，应当是现实主义作家们共同的创作目标和价值尺度；真实地表现人民大众的生存处境和命运的沉浮，应当是他们的创作基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主义作家们在创作中加大了艺术表现力的开掘，尤其是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张平从《天网》到《抉择》到《十面埋伏》到《国家干部》，可以明显看出作品的文学性在不断加强；而周梅森从《人间正道》到《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在主题不断深化的同时，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日趋丰满。他们想把社会的话题转化成文学的话题，塑造出文学的新新人物。因为他们意识到，要不断超越过去，就必须从关注问题的层面向关注人的精神的层面转化，不断提高艺术品位。陆天明的感受是：“我们创作中触及的社会矛盾，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可以说距离生活太近了，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来不及更多的沉淀思考，有时还要受到各种方面的干扰，这都容易给作品留下不少遗憾。也许就是从这个角度说，许多现实主义作品被认为‘粗糙或非文学’等。比如我在写《苍天在上》时，对腐败、对贪官的认识就十分简单，觉得他们太坏了。但几年过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那么简单了，一个人、一个官员的腐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有社会、家庭、体制等等许多因素，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到写《大雪无痕》，我对腐败官员的刻画就不那么简单化、脸谱化了。”

从理论上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并不存在一种没有价值立场的创作活动，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必然会贯彻到其创作的文本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来都是执著于对人的生存的揭示与探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的活法；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没有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老舍等人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凡俗生活隐藏下的悲剧，也看到了含泪微笑之下的希望。

现实主义虽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现实生活作简单、机械的记录。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它虽以生活的本来面目出现，但又体现出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如今的现实生活是混乱和复杂的，它是现象和本质、偶然与必然、个别和普遍的统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现实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经过了作家的主观思考和判断过滤，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高、更完善的艺术真实，是能够代表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正因为善于开掘生活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本质，并通过具体个别的形象将它反映出来，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特有的深刻和敏锐。这表明：现实主义要按照生活的固有方式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必须正确处理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个别和普遍的关系。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单纯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生活现象的真实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

当今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现实主义小说，都能正视改革的深化和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甚至无一例外地强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从而使小说和现实之间构建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深刻联系。这些作品是在社会体制和人伦关系发生深刻裂变的宏观背景下，勾勒了具有复杂心态的世纪转换时期中国社会的人物众生相。作家突破了以传统的、简单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人物与事件的是是非非的模式，而是通过原则与实力、法律与人情、政策与活用、手段与目的、真诚与谎言的较量，客观地表现人物的心理转换、道德危机和价值观念冲突等。这样，改革的阵痛、时代的阵痛与个人的命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而多侧面地展示了社会转型期在人们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从而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人性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具有了深刻的认识意义。

不可否认，目前，还有部分读者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产生逆反心理。这是因为，个别作家为了迎合少数低俗欲望者和某些领导的兴趣，使得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千篇一律的作品登上大雅之堂，出现在了图书市场，使得人们误认为这就是现实主义作品而加以排斥。读者尤其不满意的，是一些作家对当代社会广泛的劳动阶层的生存状态被挤压到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挣扎视而不见，只是

热衷于描写所谓的白领人士的贵族式生活。有些作家在小说中,对官员腐败心理本质描述时,常常是把腐败行为简单归结为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本能,从而把腐败“人性化”,轻松隔开了对现实的必要追问。

现实主义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取决于人对社会和自身认识的提高与深化。面对国民空前复杂而又不断产生嬗变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现实主义必须有相应的认识理论作补充——这就得超出文学理论的范围。认识的深化,所要反映的内容繁复驳杂,必然又要求表现形式同步图新,以增强新的表现能力。譬如,以多线条方式结构叙述情节,以全方位的视角展开故事,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等传统表现手法,对当代人的心理作深层次的探求,当然是很得力的。但是,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不一定要排斥或否定其他流派小说的艺术长处,还是要不断尽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从其他非现实主义流派中汲取一点艺术营养为好。

二 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判断

长期以来,一些作家总是为驾驭现实题材所困扰,所以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张平、周梅森等作家勇于探索,闯出了一条路子。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努力丰富与发展现实主义的探索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他们直面现实、正视现实和敢于将现实矛盾记录下来的勇气。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作家在经历了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后,创作出的自己的作品。

凭借《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现实主义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影响很大的作家周梅森,创作中坚持紧扣当代政治生活的“权力监督”“政治文明”等重大主题,直面触目惊心的现实,依靠惊心动魄的情节,引导读者深刻地思考我们的时代。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认识是:“有人把我的小说命名为政治小说,这也真实表明了我的心态。我就是要关心政治,我的小说就是要写政治家们的生活,要写大中国,给社会提供一份观察和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社会题材的作品,必然要触及反腐这样的内容与主题,但如果作家没有认识高度,反腐内容很容易走向反面,成为专揭黑暗面的、满足猎奇的“黑幕小说”。而周梅森、张平等人的作品,能够避免这种现象,靠的是紧扣时代脉搏,力求在对大众生存现状的描述与透视中揭示新的问题,获得新的认识。他们都曾经、

甚至现在依然生活在中国基层的平凡世界中，因而他们熟悉那些平常、具体因而也是最典型的属于中国的社会景观；尤其是他们由衷地热爱这些生活，关注这些生活，并且始终把自己也融入其中，触摸它，描述它，一如触摸和描述自己心灵一样地赋予这些生活以艺术的直觉和感受。于是，在他们的笔下，这些生活不但鲜活，而且立体、深刻。

以我个人的判断，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需要文学家对种种问题进行严肃深入地思考的时代，美与丑、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宝珠与泥沙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内容上最适合表现这个时代，在形式上最适合大众阅读，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仍将将成为主流，它还会涌现出新的高潮，出现精品力作。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抛弃现实主义，还应当在文学创作中大力倡导现实主义，写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来。

理解现实主义创作，必须要注意到它不是一个题材的问题，而是指作品所描绘和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它是不是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中心工作，不是判断是否是现实主义的根本依据。然而，关于这个问题却众说纷纭，理解各异。有人认为，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写政策和中心工作的，比如，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抓国有企业的转制和改革，那么，凡是涉及这一题材的，就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品；现在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那么，凡是创作与此有关的题材，就都是现实主义作品。这样的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目前的中心工作，肯定是我们社会发展与进步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或者值得宣扬的历史事件，文学创作不应当回避。但是，并不能认为所有写国企改革或者写抗战的作品，就可以称其为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在作品中倡导的思想、表现的精神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背离，那么，即使把文件都搬进作品中，或者把时代背景放在抗战时期，也不能说是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并不是只有写了中心工作才能表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范畴是丰富和广泛的，比如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社会生活，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待那个历史过程，实事求是地得出一些结论来，能够让当前农村工作有所借鉴，也应当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品。

还有一种误解是，简单地把坚持现实主义与提倡多样化割裂开来，认为某一类作品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另一类作品则是所谓的“多样化作品”，它们非此即彼，不能相容。这种片面的理解，致使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受到了伤害，模式化表



现非常严重，使得一些作品中的人物苍白，个性干瘪，情节雷同，艺术性大大减弱。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观点是：写现实主义作品，就不能考虑市场；要考虑市场回报，就不能写现实主义作品，只能写那些不严肃的、搞笑的、迎合感官刺激的东西。

对于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有人说他们不是典型现实主义的，有人说他们只是有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我想，关键是要看他们有没有一种现实主义精神。我们现在理解的现实主义，绝对不是 50 年代的那一种。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余华，前些年人们一直认为他是“先锋派”作家，而他在一次会议上却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作家。余华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开始的作品，就是典型的说明。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深厚功力，主要体现在能否把人物写得鲜活、丰满而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好的小说大都是围绕特定事件展开故事，借助其过程中各个关节点展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折射特定性格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用“性格”这面特殊的聚光镜反映生活的本质。理论界过去曾有个说法：“小说描写的生活应当是社会的折光。”现在应当修正为：小说刻画的人物性格应当是社会的折光。也就是说，小说所包容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应通过性格表现。因而，好的小说中故事的展开与情节的发展、走向及结局，主要是人物的特定性格起主导作用，而不是受主观臆想制造的外来突发性因素左右。生活中任何一个人一生中都必须面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矛盾，因而也面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困惑和选择。好的小说就是紧扣人物在事件发展中面临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的困惑与选择，展示其性格的多侧面。这种选择及其结果，蕴涵了情操与哲理、经验与教训、正确与谬误，经过作家公正、客观、科学地审视并予以准确揭示，能够给予读者一点熏陶、一点感染、一点启迪。

现实主义与多样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思想和精神，多样化更侧重于艺术表现手法。文学创作要求突出个性，强调创新。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大忌，因而不能用固定的模式来要求作家。一部作品仅有好的题材和好的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好的、生动的、新颖的，能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艺术表现手法。现实主义作品必须要由多样化的手法来表现，才能生动感人；只有打动读者，才能激发更多的人的欣赏需求，进而赢得市场。

衡量现实主义作品的价值，市场占有率是一个重要尺度。现实主义作品要进入市场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必须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艺术规律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从有关出版和发行单位的材料可以看到，近年来，一些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水准上乘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图书市场上销售看好，比如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2004年年初出版），至今已发行30多万册；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周梅森的《国家公诉》等作品，印数都达到了十几万册。在多数文学作品仅能发行几千册的当今时代，这些作品能够达到如此市场业绩，说明了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还是受读者欢迎的。

理论界近年来对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也比较关注。有人撰文指出，市场经济对于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流行性的文学读物的大量兴起。由于市场运作方式进入到文学生产领域，同时形成了对创作起明显制约作用的读者消费市场，所以，相应产生了适应于这种运作方式及消费市场的文学作品。市场经济下的优秀现实主义文学读物，既是一种尽到现代知识分子批判责任与使命的精神产品，也是一种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积淀，并通过新奇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的象征体，绝不是凭一己之兴趣，孤独地尝试着表达各种话语的所谓“美文学”。优秀现实主义文学读物的存在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将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更适宜地生存，是可提供给读者益智、消闲、娱乐的精神消费品。

从另一方面讲，市场经济使得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因而，当商品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作家顿时失去了经济地位上的优越，他们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日益被挤向了社会的边缘。这些切身相关的价值及生存难题，造成了90年代以来作家内部出现的一种商业化倾向，有的人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岗位和使命，而把所谓“生存”放在第一位。为了“生存”，部分作家争相“下海经商”，摇身变成“经济型文化人”；也有些作家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丧失了精神上必需的自律，炮制了大量媚俗的作品。

深入来看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发现其中暴露出中国作家长久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某些痼疾，这就是其独立人格的萎缩与丧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残缺，才导致作家主体精神在商业冲击下那样不堪一击。当然，这仅仅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引发了90年代初由相当多的坚守岗位的作家参